

现代中国的斯文骨肉

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

朱兴和 著



Handwritten calligraphy in red ink, likely a preface or a quot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main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The characters are in a cursive script, typical of personal notes or drafts.

上海三联书店

现代中国的斯文骨肉

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

朱兴和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朱兴和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3
ISBN 978-7-5426-4642-2

I. ①现… II. ①朱… III. ①诗人—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6198 号



现代中国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

著者 / 朱兴和

责任编辑 / 殷立平

装帧设计 / 方舟

监制 / 李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50千字

印 张 / 2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642-2/K·263

定 价 / 68.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陈三立(1853—1937)



沈曾植(1851—1922)



陈曾寿(1877—1949)



读书的陈三立



梁鼎芬(1859—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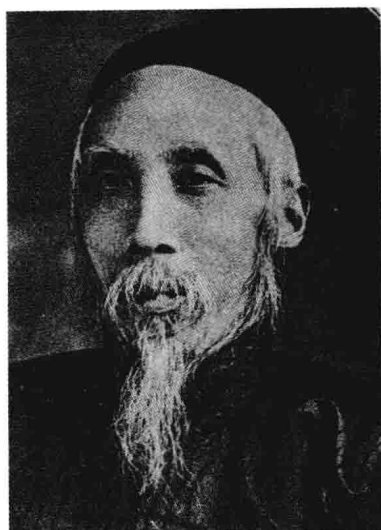
郑孝胥(1860—1938)



樊增祥(1846—1931)



繆荃孙(1844—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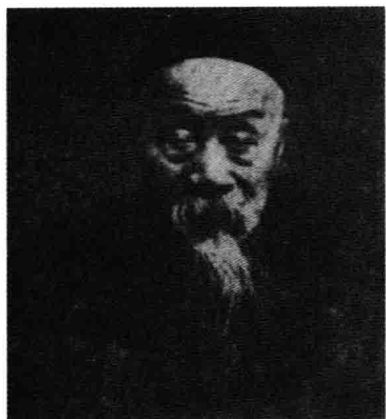
瞿鸿禨(1850—1919)



陈夔龙(湖广总督时期)



陈夔龙(1857—1948)



冯煦(1843—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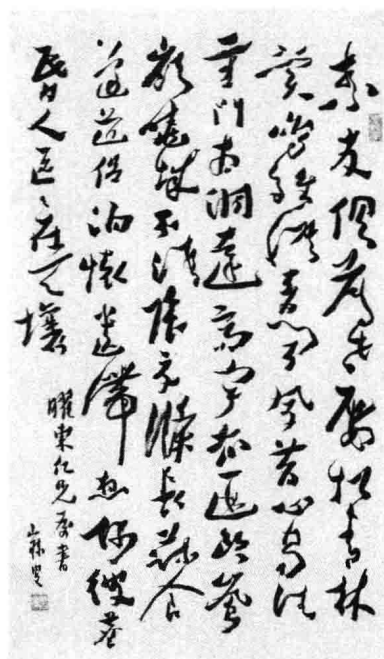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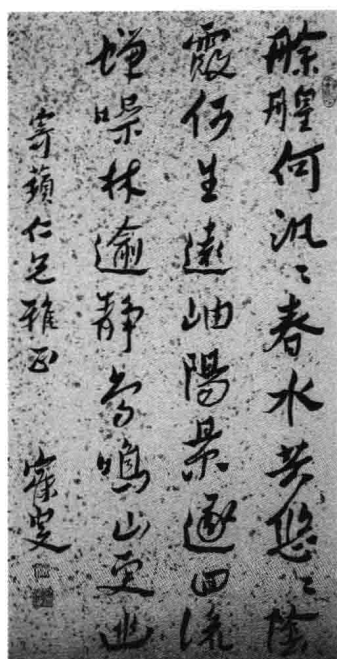
朱祖谋(1857—1931)



周树模(1860—1925)



(右图:梁鼎芬手迹)



沈曾植墨迹



梁鼎芬与广雅书局弟子合影

序 言

胡晓明

今年4月的一天，我在重庆的嘉陵江边一条船上，与朋友小聚。江水平静而缓慢地流动着，山城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宽广的江湾，江水在那里停蓄着、回旋着，有时候甚至倒流着，以一种看不见的复杂性漫衍涌动。我就想，这多么像有些地方、有些时期的历史，不是那样黑白分明、进退两截，而是新中有旧，旧里孕新，进中有退，进退相依，交互地共生在一种状态里。朱兴和博士研究的上海超社逸社诗人群落，就属于这样的中国近代文人生态。

超社逸社的诗人群体，约有三十人左右，都是晚清与民国初年的精英知识人。在民国初年翻天覆地的大时代，竟然活跃了将近二十年。他们有的是退休的前朝官员，有的是职业画家与书人，有的是没落潦倒的寓公，有的是雄心勃勃、图谋东山再起的政治遗民。他们为什么会聚在一起？原因不是政治、不是利益、不是物质享受，而是文化，亦即王国维所说的“斯文骨肉”。王国维在《彊村校词图序》中，借着朱彊村一回著名的诗词雅集，分析了古代至近代士大夫安顿身心的三种方式，一种是“归于乡里”，一种是“乐居游宦之地山川之美”，然而到了近代，士大夫们身处危世，进退无据，乡关没有了，城市也不亲，失魂落魄，归去不成，山川无色，唯有“友朋文字之往复”，即士大夫们自己相互构筑的文字精神世界，聊可托命于万一。

这至少表明，政治制度兴衰与朝代更替，其实并不能等同于文化

世界的生灭，文化世界有其尊严与意义。同时也表明，士大夫“文字世界”从传统到近代之奇幻飘流，遭遇了它的真正敌人，即科学主义与物质主义，现代中国因而走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的关头。

这一幅文人精神生态史的文化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人在人之上，是浪漫主义，人在人之下，是科学主义。近代以还，这两种主义，甚嚣尘上。革命与现代化，也是一种浪漫主义。现在，到了反思这两种主义的时代，到了再认传统中国的古典主义的时代了。至少提醒人们，中国古典政治理念与文化信念，不应简单加以一笔抹杀。

当然，超社逸社三十余人，遭际、性情各有不同，有的人心地猥琐，有些人心如皎月。作为一个群体性的研究，无法把他们作一例看。而且，这样一种近代社群，有很多张力与矛盾，譬如，既是斯文骨肉的宝地，又是风雨摇坠的老屋，超也不成，逸也不成。然而，层次的丰富脉络里，这张力之内，这未成与未定之间，即有人性、人心与人世的无奈、无解。这本身，作为近代连接古代，又通往现代的一座桥梁，兼具有同时理解古今文人的特殊意味。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座桥，走过去看两边奇特的文化风景。

是为序。

2013年12月8日

目 次

序言	1
引言:写作缘起及研究现状	1
第一章 “流人”初集于海滨	8
第一节 大变局中的上海租界	9
第二节 “流人”类聚于沪渎	12
第三节 上海租界遗民圈的基本形成	23
第四节 诗人群体形成的政治基础	32
第二章 超社的兴废	47
第一节 超社的发起	49
第二节 最初的两社集	57
第三节 此后历次集会之概况	64
第四节 超社的危机和解体	80
第三章 逸社的继起与消歇	88
第一节 逸社的继起	89
第二节 逸社的重开	101
第三节 逸社的风流云散	112

第四章 出处之际的精神困境	132
第一节 樊增祥的“思想革命”	133
第二节 周树模的翻覆心迹	141
第三节 史馆之蛊惑	151
第四节 出处之际的经济问题	158
第五章 复辟:孤臣孽子之心	167
第一节 秘密倒袁	168
第二节 张勋复辟	181
第三节 筹建满洲国	199
第六章 遗民诗歌中的情感世界	210
第一节 亡国之恨	210
第二节 乡关之恋	217
第三节 人生追忆	223
第四节 隐逸之思	230
第五节 文化情怀	238
第七章 六位诗人的人格与诗格	246
第一节 陈三立	247
第二节 沈曾植	262
第三节 郑孝胥	271
第四节 陈曾寿	285
第五节 樊增祥	298
第六节 梁鼎芬	310
第八章 生存处境与苦心孤诣	321
第一节 宏观时势	322

第二节 微观境遇	331
第三节 苦心孤诣	339
附录一：主要人物简介	350
附录二：超社社集活动情况考略	359
附录三：逸社社集活动情况考略	372
参考文献	399
后记	404

引言：写作缘起及研究现状

2005年，在阅读业师胡晓明先生编著的《近代上海诗学系年初编》一书的过程中，我频频发现超社和逸社的字眼。入社成员大多是清末民初旧体诗坛中的著名人物，诸如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樊增祥，等等。他们在民国初年结社唱和，诗酒风流，在上海租界的十里洋场之中，构造了一个与外界迥然不同而又快然自足的精神世界。我马上意识到，在晚清民国的文学、政治和文化版图上，以超社、逸社为代表的清代遗民诗人群体的存在，应当具有非凡的意味。遗憾的是，学界对此知之甚少。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想要勾勒出超社和逸社的面目，公之于众，便以此为题，撰写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

一、论题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文学史上，古往今来，存在着无数的诗社或文学社团。近现代文学史中，关于社团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也一直层出不穷，南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但是，对于超社和逸社，一般文学研究者甚至近现代文学研究者恐怕还比较陌生，因为这两个诗社长期以来一直未能成为近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对象。游国恩版的《中国文学史》和复旦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没有提到超社和逸社。在比较专门的近现代文学史如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和郭延礼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那里，仍然没有超社和逸社的影子。足见超社和逸社长期以来未能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这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出现之前,超社逸社成员的作品集基本上没有出版。直到最近几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才组织人力对少数特别著名的诗人的作品加以整理,并且予以出版。但是,迄今为止,大部分人的作品都藏在图书馆古籍部的某个角落里,无人问津,仍在等待出版的机会。第二,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之中,满清遗老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概念,而超社逸社就是由满清遗老所组成的诗社,所以,在政治和文化上,他们一直被认为是“腐朽”和“顽固”的代表,一直得不到重视。说到底,这两个原因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政治观念严重地干扰了关于超社和逸社的研究工作。

但是,在另一方面,关于超社和逸社的重要人物如陈三立、郑孝胥等人的研究却从未间断过。陈三立和郑孝胥曾一度被认为是民国初年中国诗坛的代表人物。在民国各类诗话如《石遗室诗话》中,他们经常是被讨论的中心人物。此外,在汪国垣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他们也都占有很重要的分量。比如,超社逸社诗人群体中,有15人进入了《光宣诗坛点将录》,其中,陈三立和郑孝胥还占据了第一、第二的席位。1949年之后,钱仲联对清末民初的古典诗人也有精深的研究,其实许多人都是超社和逸社的成员。在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中,介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的篇幅也不小。不过,以超社和逸社为中心的诗人群体研究仍然没有出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近现代古典诗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批诗文集和诗话先后出版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钱仲联作序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和张寅彭作序的《民国诗话丛编》。这为近代诗学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第二,出现了编年类的资料简编《近代上海诗学系年初编》(胡晓明、李瑞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这部著作以编年的形式,系统地展示了清末民初新旧诗坛的面貌,其中,相当多的篇幅提到了超社和逸社的活动。第三,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以个案研究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其中,许

多都与超社逸社相关。比如，韩春英的《论梁鼎芬：晚清忠君卫道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李瑞明的《雅人深致——沈曾植诗学略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杨晓波的《郑孝胥诗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许全胜的《沈曾植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孙老虎的《陈三立诗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等等。其中，《沈曾植年谱长编》（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材料详实，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之一。第四，大概在上述研究思潮的推动之下，超社逸社第一次进入了文学史书写。袁进先生在《上海文学通史》近代编中说：“1913年，上海有一个‘超社’开始聚会，由逊清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瞿鸿禨主持。参加者多为遗老，有沈瑜庆、沈曾植、梁鼎芬、缪荃孙、樊增祥、陈三立、林开蕃、周树模等人。一年之中集会十余次。1915年改名为‘逸社’，继有入社者冯煦、陈夔龙、朱孝臧、王乃徵等，每次集会必定以诗会友，迭相唱和。聚会的场所在樊园、泊园或其他某人之寓所。除社集外，静安寺、曹家渡小万柳堂、南市半淞园等处，也常是诗人们集会的地方。这个诗社成为‘同光体’的活动中心。”^①他还说：“‘同光体’诗人民国建立后被目为遗老遗少，被视为‘顽固派’，其实是很片面的。‘同光体’诗人当年大都是改革者，并不是‘顽固派’，他们在文化上大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并不反对引进西学。”^②他也注意到，同光体作家大多是爱国者，同时又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比如，沈曾植对“专制”一词，就坚持着中国式的理解。袁先生认为，“这种面对外来文化挑战的回应，坚持有保留地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可以理解为一种‘反现代性’，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回应。”^③应该说，这是近年来，在宏观理论上对以超社逸社诗人为主

① 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第44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同上书，第447页。

③ 同上书，第449页。

体的同光诗人群体把握最准确的一种说法。不过,因为体例的原因,《上海文学通史》不可能对超社逸社做细致的研究。第五,近年还出现了跟超社逸社有关的群体研究论著,比如王培军的《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中华书局,2008年)和杨萌芽的《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王培军以笺证的方式做了很好的资料拓展性的工作,但是,超社和逸社不是他的中心问题,况且因为体例的原因,他也不可能对超社、逸社做系统的论述。杨萌芽在其论文的第三章第三节,专门谈到超社和逸社在上海的结社活动,甚至对诗社的集会做过一些考证工作,这是近年来关于超社逸社最细致的研究工作,可惜超社逸社只是他庞大架构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因此,还是不能有充分的研究。

除了近现代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有时也会提及超社和逸社。比如,王雷的《民国初年前清遗老群体心态剖析》(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中涉及了一批超社和逸社的成员。但王雷所做的是纯粹的史学研究,并不涉及文学,而且,他的外延要比超社逸社宽泛得多。张艳国的《社会转折关头的正统心态》一文也提到超社和逸社。他说:“复辟分子、遗老遗少们的串联、密谋,还借助‘诗社’等形式的组织,进行有组织的活动。1912年,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曰‘超社’的组织。超社的发起人是沈曾植、瞿鸿禨、陈三立等。超社成员每月必有一聚,饮酒吟诗,抨击时政。他们以亡国之臣自居,抒发亡国之恨。受超社的影响,相继成立了‘同抱故国之感’的‘淞社’和‘逸社’、‘希社’等等。虽然这些诗社的成分比较复杂,但从其组织者来看,大体上是被前清遗老所控制的,因而它们是复辟分子集结密谋的场所,是复辟分子策划‘反民复清大业’的政治舞台。”^①遗憾的是,虽然这篇文章发表于2004年,但在立论上对过去的体系没有什么突破。不过,

^① 张艳国:《社会转折关头的正统心态——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与尊孔关系探讨》,刘大钧主编《元典哲蕴》,第5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